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薪火映黔山



地母文萃景区之地母洞。

►文澜阁《书库全书》原本书影。

贵阳地母洞：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战时书库”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图

■ 国宝西迁 ■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我国古代卷帙最为浩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开纂,乾隆帝诏辑佚书,广征天下遗书。贵州巡抚图思德上奏称“黔省凤号荒微,人文卑陋”,无书可献。但《四库全书》中有黔人身影:安顺陈法所著《易笺》八卷,为黔地唯一人选者,由山东巡抚采进;铜仁徐如澍任武英殿四库馆分校、编修,参编《四库全书》;广顺刘清誉录《四库全书》七年有余。《四库全书》历十四年编成,基本囊括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涉猎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问领域,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藪”的美誉,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万里长城’”。四库成书后,先后缮写七部分藏南北,并效仿宁波范氏天一阁,建造了七座阁楼存放,史称“北四阁”和“南三阁”。“北四阁”为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南三阁”即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

文澜阁《四库全书》在不同时期,装藏于不同的书籍中:乾隆年间颁书,书库封于统一的楠木书盒中。晚清内忧外患、战火四起,文澜阁本成为“南三阁”唯一幸存者。光绪年间重修文澜阁楼,制黑色木质存书柜,双开门结构,门上有“文澜阁尊藏,钦定四库全书”鎏金字样,人力难以搬动。另有大大小小、形状并不规则的木箱若干,木料也不统一。民国初年,文澜阁本迁至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妥善保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日寇铁蹄逼近,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字叔凉)先生着手准备图书迁徙事宜,图书保管员毛春翔先生始终其事,其在一九四七年所撰《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中,详述图书播迁始末: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倭寇在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未几,沪杭线,时有敌机肆扰,馆长陈叔凉恐图书被炸,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七月末,情势日益恶劣,乃决定迁运日期及地点。日期,定于八月四日。地点,决定富阳鱼山石马村赵宅……八月一日,全馆职员聚集孤山分馆,点书装箱,至三日深夜装竣。计图书一百四十箱,善本八十八箱,共二百廿八箱。四日晨图书立馆,运往江干装一大船,余奉命随书出发,负保管之责。五日午刻,抵达鱼山。

富阳鱼山与省垣杭州仅隔一条富春江。一九三七年十月,敌机轰炸杭州日益剧烈,“鱼山可闻爆炸声”“鱼山安全顿成问题,乃再议迁建德”。二百余箱书,一夜搬运上船,越桐庐、至俞赵,因船重水急,无法前行。彼时,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已于十一月十五日到达建德。于是商请急派大卡车一辆,将图书分批陆运至建德。十二月,书抵建德。十二月二十四日,杭州沦陷,建德震动。一九三八年一月起,图书再次装箱启程,经金华抵龙泉,至二月事竣。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派遣九人从上海赶赴杭州,追寻文澜阁《四库全书》下落,此时图书已到浙江龙泉——这一细节载于日本学者松本刚《掠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一书。

杭州西子湖畔,浙江图书馆地下书库,原本文澜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文澜阁本”)在远离日寇侵华战火八十年后,其保管方式至今仍处于战备状态:三万六千册典籍分门别类地存放在三百六十个组合樟木书箱里,箱上有编号,四箱为一组;书库平日存放于图书馆混凝土结构的地下书库里,倘若遭遇紧急情况,车辆可直接进入书库转移书箱。抗战烽火期间老一辈文澜阁本护书人留下的传统,至今仍在延续。

离杭州两千公里外的贵阳鹿冲关森林公园金鳌山(亦名文澜山)地母文萃景区,以“浴火文澜 战时书库”为定位,用“一洞一台一线一院”(即地母洞、晒书台、西迁故事线、文澜院)的手笔,接续起文澜阁本八十多年前的西迁文脉。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文澜阁本西迁“战时大后方”贵阳存藏六年又八个月,其间历三次转移,终归“战时书库”地母洞秘藏五年零八个月。

“当战火席卷华夏,国之瑰宝穿越风烟,于洞穴幽光中静待黎明;文人学者与黔中百姓相遇,在对话中点燃新的思想星火。”当下正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的“华夏同御侮 黔山续文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化·文物·文献展”,如是描述贵阳地母洞之于国宝的意义。



贵州省图书馆藏《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

置馆内妥善地处暂为储藏,并指派馆员会同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诚逐日开箱清理,计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三千六百四十七部、四万二千五百三十六册。细目详列附呈之书目单内。清理后并飭馆员与史君当面加封封存。”

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舍由棉花街旧粮道署修缮改造而来,面积狭小,房屋结构也不合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贵州省政府及教育厅训令贵州省立图书馆绘具图样及预算,另建坚实书库,以装储图书。五月二十七日,贵州省立图书馆呈送《书库工程预算表》《设计图》《建筑计划说明书》各一份。但战时全国吃紧,贵州财力无多,另建书库之议遂告搁置。九月,省教育厅垫资购得张家祠堂作为藏书地。

张家祠堂在贵阳威清门外侧,有大小房屋数十间,此前用于存放弹药之用,房屋的质量与数量颇符合藏书需求。稍加修缮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图书迁藏于张家祠堂,夏定

域先生奉命前往保管。

贵阳僻处万山之中,加之又是抗战大后方,大家以为图书就此安全了。孰料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十八架敌机袭击贵阳,城中心最繁华的大十字、小十字毁于一旦,离城中心两公里处的张家祠堂虽幸免于难,然终究离城太近,敌机难免再来,图书安全终属可虑。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建议,贵阳北郊的地母洞可用。经实地考察,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图书迁往地母洞存藏。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在兰端禄馆长的陪同下,前往查勘地母洞地形及图书保管情形。他写道:“洞在贵阳城北十二里,位旧筑渝官道右侧一山腰中,西南向,山作尖锥形,洞身距山顶约五六十丈,洞口阔四丈,高亦如之,系一天然洞,洞内多有石钟乳下垂,洞积约十一二方丈,略作方形,近底处地势稍低。左右侧各有套洞,左侧之洞略高,现为贵州省立图书馆所派之馆工二人寝所;右侧之洞,原为炊爨之所,现已迁去。洞口外筑有半环形土垣,高约及丈,右侧

1948年印成,历经三十年之久,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料征集。当文澜阁本西迁来筑,诸位修纂人员自然想到辑纂《四库全书》有关贵州的资料。

李独清先生奉命前往地母洞抄录。其有《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藏贵阳地母洞 往抄有关黔中记载以诗纪事四首》,其中一首云:“将见杭城陷,潜师倭又回。山川惊鼓角,文物化烟埃。秘笈安全徙,吨诬捆载来。筑垣地母洞,不待斧斤开。黔中文献少,如遇馈粮。脉望推书出,除糜隔砚香。土官抄底簿,彙邑辨何方。破晓飞驰至,逃空地亦良。”对文献典籍的渴望之情溢于言表。详细抄书经过,李独清先生在《续修<贵州通志>和征集文献经过》所著甚详:“浙江图书馆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至贵阳地母洞,教育部有邀请各大学派人校勘是书之意,馆中同人以为机会难得,经呈报省府转教育部将趁校勘之便,录抄有关贵州史料,馆中委托我到地母洞翻阅文澜阁藏书,将其中涉及黔中的资料抄出。我乃偕书手二人,自一九四〇年五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历时年余抄完。”完毕后,李先生曾将这批资料编排为八册,定名为《贵州史料第一集》,可惜因经费困难无从付印,又遇战乱,材料多数散佚。但这些资料仍发挥了重大作用,修正了通志中所记载的某些不实材料,填补了贵州不少史料空白。当外来文化种子与贵州山川人文相互滋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保存与延续的历史,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苦难中自我更新的磅礴力量。

一九四二年九月,国立贵州大学不过数月,首任校长张廷休向教育部呈文:“文澜阁《四库全书》内移贵阳,此在原省实为千载难逢之盛事。请求就近传抄一部,留皮贵州广为传布。”呈文获批。为做好传抄工作,国立贵州大学特推举了柳翼谋、崔莘村、全受仲三位先生拟定传抄计划、办法、选书标准和书目。一九四三年,国立贵州大学制定《选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序传本拟目》,选抄书目一百零三种三千九百九十九卷。贵州大学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卷一八〇“修建四库全书保管员工住宅清册”,载有教育部训令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派员与浙江省国立图书馆商订“传抄四库全书计划书”事宜,并在地母洞外建设茅屋以为保管员住所及传抄四库全书之处所。为此,贵州大学及保管员毛春翔、一起拟定搬迁、建库、传抄计划,教育部拨款八万五千元来完成此项计划。计划未及施行,书库运往重庆,抄书之事未成。

抗战胜利后,文澜阁本的归宿有三:一是返回杭州。当初从杭州迁来,理所应当完璧归浙;二是迁往南京。南京是国民政府首府,书库前往可为南京文化中心地位增重;三是留在贵州。西南地区文化发展滞后,贵州又为西南五省的交通枢纽。留贵州,可以带动西南文化的发展。

书留何处?教育部专员前去拜访张宗祥先生。张先生说:“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是国民政府从前清接收而来,属于公物,任凭政府处置;但在补抄文澜阁本时,费用全部出在浙江,可以说该书是浙江父老的血汗。要问该书的归属,当问问浙江人的意见。”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文澜阁《四库全书》返迁杭州。

■ 学人用书 ■

书在藏,更在于用。黔地文献流传至今者,始于明代,明以前既稀少且不获存。这使得历史上的“贵州”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让“贵州”成为“贵州史”,成为历代贵州学人的心愿。文澜阁本在黔,是贵州学人用书的良机,亦是提高西南文化的契机。

一九一九年,任可澄主持新修民国版《贵州通志》,以弥补旧版通志年久失修、疏漏过甚的缺点。该通志至



贵州博物馆“华夏同御侮 黔山续文脉”展上,还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场景。